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文月娥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关键词: 鲁迅; 郭沫若; 翻译思想; 比较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0)03-0112-05

引言

鲁迅与郭沫若都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与郭沫若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1]。

鲁迅与郭沫若这两位处于时代文化巅峰的巨人,有着很多共同点:留学日本、弃医从文、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受西方文化及文学的影响等,因此鲁迅与郭沫若经常被当做比较研究的客体。然而,对于作为翻译家的他们,比较研究鲜有涉及。

毋庸置疑,鲁迅与郭沫若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探讨上也颇有建树。鲁迅一生具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翻译了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计500余万字。郭沫若一生也是著译颇丰,翻译了10个国家60多位作家的100多部作品,总字数达300多万字。鲁迅与郭沫若成功的翻译实践也促进了其翻译理论的完备,尽管他们论述翻译理论思想的文章不多,但也不乏真知灼见。本文拟对鲁迅与郭沫若的主要翻译思想进行比较。

一、翻译选材:“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

鲁迅与郭沫若都极为重视外国文化的译介工作,但两人对翻译材料的选取标准却有所不同。翻译选材标准的不同主要缘于他们不同的文艺主张: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王宏志认为,鲁迅的翻译,“从选材上看,他没有摆脱‘小说界革命’、‘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的范畴,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政治倾向相吻合。鲁迅对译本的选择,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2]187}。其功利主义就是希望能把文学和翻译作为“改革社会的器械”,也正如鲁迅自己所言,“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184}。“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观贯穿于鲁迅的整个翻译生涯。在鲁迅看来,“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立意是在深究,或在解决,或者坠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3]。因此,鲁迅偏于译介苏俄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

收稿日期: 2010-01-1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08C315); 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YBB263)

作者简介: 文月娥(1978-),女,湖南衡阳人,讲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品,译介那些反映被压迫的奴隶如何冲破黑暗获取光明和人权的作品,如《毁灭》《铁流》《死魂灵》《工人绥惠略夫》《苦闷的象征》《战争中的威尔珂》等都属于这一类。鲁迅把介绍俄罗斯文学喻为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偷火,当做给起义的奴隶私运军火,他希望俄罗斯文学能改造中国社会。许广平也说:“鲁迅从事文学翻译是从《域外小说集》开始的,他着重于东欧和北欧文学的介绍,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富于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翻译过来,不但能借此转移性情,更可改造社会。”^{[4] 315}

相比之下,郭沫若的文艺主张则没有那么纯粹。有学者认为郭沫若的翻译主张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阶段:大致可以以《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翻译为分界线,前期是以“为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翻译为主线,后期则以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为主线,但二者并非泾渭分明^[5]。这样的区分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在研读郭沫若的翻译年表后发现,尽管郭沫若后期翻译了一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但歌德、海涅、雪莱等的诗歌翻译基本贯穿了其整个翻译生涯,所以可以说,“为艺术而艺术”是郭沫若文艺主张的主导。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将,他与创造社的文艺主张基本一致,主要是“为艺术而艺术”,反对把艺术看做工具,认为“艺术是绝对的,超越一切的。把艺术看做一种工具,这明明是艺术王国的叛徒”^{[6] 100},主张所要表现的是自我,是“自然流露”,坚持“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调子,心琴上弹出来的旋律”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6] 101}。秉着这样的翻译选材原则,郭沫若翻译了一些俄、德、英等国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1922年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在于通过少年维特的恋爱悲剧,对腐朽的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宣扬了情感解放的思想。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和史托姆的《茵梦湖》还翻译了歌德、海涅、雪莱的诗以及屠格涅夫的《新时代》等。

鲁迅与郭沫若的翻译选材标准之不同缘于两人不同的文艺主张。不同的文艺主张背后隐藏着深层原因。

一是由于成长环境及文化氛围的不同而造

成两人不同的个性。鲁迅成长于绍兴,受当时吴越文化圈的儒家文化影响颇深。鲁迅生为长子,亲历“小康堕入困顿”的家道中衰,寄人篱下看尽世态炎凉。而郭沫若从小生活在巴蜀之地的商绅之家,家庭环境优裕。郭沫若排行第八,天资聪慧,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同辈对他刮目相待。少年郭沫若看到的都是人生的光明面,无法体味人间疾苦。此外,郭沫若成长于巴蜀文化圈,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由于鲁迅和郭沫若的成长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也就形成了他们不同的个性。鲁迅个性忧郁,理性而严肃;而郭沫若则富于激情与幻想,感情丰富,狂放不羁。

二是由于两人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识有所不同。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较之郭沫若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鲁迅的外祖母在农村,他自幼寄人篱下,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的苦难有所同情。从日本回国后的三十年间,鲁迅一直住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关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以及日寇侵华等,他都是耳闻目睹或者直接参与了一些活动。鲁迅过多地看到社会的“死相”、国家的“无声”、国民灵魂的“麻木”^[7],再加上他善于精细地观察和冷静地剖析,因而他对国内社会状况的理解是深刻的。而郭沫若呢,诚如他自己所说:“在新文艺运动以来的二十年中,我差不多整个都在国外,自己时时痛感着对中国现实的隔膜。”^[8]由于个性不同、对社会的认识不同,鲁迅与郭沫若对拟译文本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标准。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最终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郭沫若倡导“为艺术而艺术”,最终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巨匠。

二、翻译标准:“宁信而不顺”与“风韵译”

鲁迅在翻译界有着深远影响的是其“洋化”的翻译思想,或者说“宁信而不顺”的直译。“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4] 268}当然,对于译笔的“顺”与“不顺”,鲁迅提出了辩证的解释,他在给瞿秋白的回信中说:“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绝不是说‘跪下’要译作

‘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4]277-288}由此可见，鲁迅也知道“直译”给读者带来的困难。但他认为：“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剝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剝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4]30}因此，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就一直坚持直译，“词质朴讷”，使“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4]260}。

而“风韵译”是郭沫若认可的翻译标准。何谓“风韵译”呢？“风”是对文章美学特质的一种抽象说法，如魏晋南北朝的“建安风骨”；“韵”则指文章的雅致，常说成“神韵”、“风韵”。因此，“风韵”主要是一种形式美学。郭沫若主张“风韵译”，主要是从译文的角度要求翻译不仅要通达、雅致，还要注意形式美。郭沫若不赞成直译，认为“逐字逐句的直译，终是呆笨的方法，并且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逐字逐句的直译，把死的字面虽然照顾着了，把活的精神却是遗失了”^[9]，于是提出“风韵译”。“译诗于直译，意译之外，还有一种风韵译。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尚不失为佳品。若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艺坛之外了。”^{[10]260}“风韵译”最初是针对诗歌翻译而言的，后来郭沫若又强调整个文学翻译也必须不失原作的“风韵”。郭沫若在《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一文中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以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10]261}郭沫若的艺术风格豪放、洋溢，与他无拘无束的个性气质相一致。

鲁迅与郭沫若对“宁信而不顺”与“风韵译”的不同态度，集中体现在语言和内容上。鲁迅从具体的翻译实践出发，指出翻译的两难境地——“信”与“顺”的问题。在“求易解”（“顺”）与“存洋气”（“信”）发生矛盾时，他极力主张保存原作的风姿，推崇并身体力行“硬译”。鲁迅认为，“宁信而不顺”的译本“不但在于输入新的内容，

也在于输入新的表现法。……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些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4]276}。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不是要求译文忠实于原文，而是想引进新的表达法，以此来推进主体文化的语文改革。应该说，鲁迅的翻译主张是他“拿来主义”思想的体现，有着很强的功利性。郭沫若反对直译，倡导“风韵译”，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尤其要注意“雅”，“因为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4]498}。郭沫若解释说，“雅”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4]500}。郭沫若在翻译过程中注重自我情感的投入和抒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翻译的无功利性。

由此可见，两种不同的翻译主张也反映了鲁迅与郭沫若对翻译功能及目的的不同理解。

三、译者地位：“显形”与“隐形”

译者的“显形”（visibility）与“隐形”（invisibility）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的术语。韦努蒂对译者身份进行了解构主义分析，认为长期以来译者在译作中的隐形以及地位低下是由于传统翻译所倡导的归化翻译造成的，因而建议使用异化策略来改变译者的隐形状态。译者的显形与隐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本身的翻译思想和策略的归属，即对归化和异化的选择。在实际操作中，归化使译者隐形，而异化使译者显形。虽然鲁迅与郭沫若都没有直接对译者地位作过论述，但从他们的翻译见解及译文中可以洞察到他们对译者地位的看法。

鲁迅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开始，就身体力行，用直译的方式来翻译。鲁迅后来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11]67}鲁迅在《出了象牙塔》后记中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4]307}对于鲁迅直译的译文，梁实秋曾经说过：“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出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11]66}用韦努蒂的术语来说，鲁迅的翻译采用

的是异化策略,面向原语,保留了原语的表达方式及文化,其目的在于引进原滋原味的域外文化。这样既可以移情,又可以益智,还彰显了译者的存在,让译者显形。

郭沫若在论述翻译的文章中多次阐释自己对翻译的看法。他说:“……视该作品的表现和内涵,不啻如自己出,乃从而为迫不得已的移译。”^{[4] 329-330}“——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创作一样。”^{[4] 334}郭沫若在翻译《浮士德》时谈道:“我翻译它,也就好像我自己做文章。”这种“合而为一”的创造性翻译为郭沫若的译文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让读者读译文就仿佛读的是原创,看不到翻译的痕迹。对此,著名翻译家楼适夷也有评论:“我们读他的译作常常感到好像在读他自己的创作,似乎根本不存在两国文字的界限,没有移植的痕迹,因为他把原作的精神实质和艺术风格融注在自己的笔端。”^[12]郭沫若的译文自然流畅,是归化的译文。在郭沫若的译文中,译者是隐形的。

四、翻译影响: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尽管鲁迅与郭沫若在译学思想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对待翻译的态度,都主张复译,更注重翻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鲁迅指出,翻译“不但在于输入新的内容,也在于输入新的表现法”^{[4] 276}。鲁迅还指出:“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4] 289}在鲁迅看来,翻译不仅改造、完善了中国语文,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繁荣。无独有偶,郭沫若对翻译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持相似的观点。郭沫若在《浮士德》简论中说:“……摄取中国人民的言语,而使它得到提炼,滋补,定型,更进使中国文学也因而近代化。……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4] 335}后来,郭沫若又多次强调:翻译“可以促进本国的创作,促进作家的创作欲;作家读了翻译作品,可以学习它的表现生活的方法。通过翻译,也可以帮助我国语文的改进。……可以学习别国语言的构成和运用,采取它们

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4] 498}。由此可见,鲁迅与郭沫若都非常注重翻译的功用及社会影响。大道之行,殊途同归^[13]。鲁迅与郭沫若尽管拥有不同的翻译理念,但都促进了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发展。鲁迅在“拿来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的译介工作,形成了其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被誉为“不仅改写了小说翻译史上的色调,也开启了文学翻译新的风气”。而郭沫若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对翻译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变得更加成熟,它们丰富了我国翻译理论文库,对广大翻译工作者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4]。这样的评价也得到了佐证。周恩来就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15] 37}鲁迅和郭沫若是“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两面光辉的战斗旗帜”^{[15] 43}。

结 语

鲁迅与郭沫若虽然生在同一时代,只相隔 11 年,但两人的经历稍有不同,个性、气质和艺术风格也不同,一个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两人在翻译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见解: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因此,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选择了现实主义作品,郭沫若多选择浪漫主义作品;鲁迅主张直译,引进西方表达方式,改革中国语文;郭沫若主张“风韵译”,更多地强调作品的艺术性。正因为拥有不同的翻译思想,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鲁迅与郭沫若各自的译文表现出译者“显形”与“隐形”。但殊途同归,他们最终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参考文献:

- [1] 黄曼君. 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与新文学主潮[J]. 理论与创作, 1992 (3): 33
- [2] 王宏志. 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 [3] 鲁迅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81: 432
- [4] 罗新璋. 翻译论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5] 孔令翠. 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与翻译选择 [J]. 国外理论动态, 2009 (7): 97.
- [6] 黄己.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 [7] 杨枫. 在“传统”中反传统: 鲁迅、郭沫若之比较 [J]. 鲁迅研究月刊, 2003 (10): 77
- [8] 刘季华. 鲁迅与郭沫若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J]. 郭沫若学刊, 1998 (3): 21.
- [9] 熊辉. 论郭沫若的“风韵译”观念及其历史意义 [J]. 郭沫若学刊, 2008 (1): 62
- [10]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1] 张景华. 从“硬译”透视鲁迅对中国文化转型的探索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 (3).
- [12] 楼适夷. 漫谈郭沫若同志与外国文学 [J]. 世界文学, 1978 (1): 16
- [13] 曾庆元. 大道之行, 殊途同归——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思想、创作与外国文化之关系的比较研究 [J].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1, (6): 720
- [14] 袁锦翔. 郭沫若翻译初探 [J]. 翻译通讯, 1984 (9): 10
- [15] 李彪. 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 [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 (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u Xun's and Guo Moruo's Translation Thoughts

WEN Yue'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Both Lu Xun and Guo Moru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y are known a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Gemin". In translation, Lu Xun and Guo Moruo are with unique insights and ideas, mainly in the choosing translation material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in the translator's status embodied by their translation thoughts. In the choosing translation materials, Lu Xun insists on "art for life's sake" while Guo Moruo advocates "art for art's sake"; i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Lu Xun employs literal translation while Guo Moruo uses "charming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or's status, "visibility" is embodied in Lu Xun's translation while the "invisibility" is characteristic of Guo Moruo's. 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ideas in the translation, they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occurrence and prosperit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ir rich translations and insightful translation thoughts.

Key words Lu Xun, Guo Moruo, translation thoughts, comparison

[责任编辑 张莲英]